

可耻的是读都没读过却胡说八道。

你读过你评论的作品吗

□李新勇

二

十年战争期间不同士段的士兵,并以逼真的叙述质疑这场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的战争。作者的实录与苏联官方宣传完全相反。

从这部书出版后遭到参战士兵家属的批评和起诉的情形看,它更接近纪实文学。在西方文学界,除诗歌外,更愿意将小说称为虚构作品,而将纪实文学、散文等以写实为主的作品称为非虚构作品。概念宽泛了,可容发挥和纵深的空间更大。

以此类推,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核辐射区灾难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编年史》、访谈亲历二战的白俄罗斯女性的《战争中没有女性》以及以101个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士兵和哲学家的普通人对童年时所见到的战争回忆的《最后的见证者》,都应该归入非虚构文学一类。

“非虚构文学”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杜鲁门·卡博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两部书均以杀人犯为主角,描述了杀人犯也并非彻底冷血。作品均取材于真实案例,并因文学性的介入而使两部作品拥有新闻报道和法律陈词无法表达的复杂性、深刻性和丰厚性。

“非虚构文学”的文学特性在于作者

是事件的发现者、见证者、亲历者和记录者。这四个“者”是非虚构文学的生命。在没有惯例的现场,说出便是照亮。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通过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呈现了二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苏联结束后社会转型等重大事件。用她的话说“我的书是我出街头、在室外认真观察和聆听而来的”“抓住真实,这就是我之所想”。这位新闻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始终在探寻事件历史的真相。除了事实真相外,更值得肯定的是她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独立思考。

我们不妨读读她的作品,感受这位女性作家追求真实的勇气和担当。

莫言老师凭借一本本厚实的“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长篇小说,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好几年没有推出作品,据说那几年没有写出来什么。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时间写,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写,或者说写是写了,只是没有拿出来,让喜欢他的读者非常着急。那几年估计莫言老师更着急,没时间写跟没有写的结果是一样的,换了别人说不定早骂开了:狗日的诺奖!要是写了没有拿出来面世,换了一般人,便觉得真是错过了一次趁热打铁的发财机会。

相对于其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老师获奖的时候,确实是年轻的,还不满六十岁,正值创作上的壮年时期。获奖之后,各种关注全都聚焦在他那里,他的一举一动、一词一句甚至一声咳嗽都可能被人拿去从形而上和形而下各方面进行分析,身处社会舆论的漩涡之中,被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绑架,各种喧嚣过耳,令其内心无法沉静下来。而其他诺奖获得者大多已经七八十岁,垂垂老矣,一生的写作接近收笔,此奖相当于盖棺定论。

几乎每个写作者都有一个获奖梦。获奖既是对文学创作的肯定,同时,也能给写作者带来经济收入提高、社会地位改变、生存环境改观、文坛江湖地位提升等诸般益处。但倘若一个年轻的作者,因为获奖而使创作受到影响,那这个奖对写作者的成长和发展,也许不一定是好事。

那些年轻时认真赶路的人,是值得尊重的;那些上了一定年纪还在认真赶路的人,是值得敬仰的。

2020年,莫言的《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正式宣告沉寂期结束。再次走进读者视线的莫言老师,却被另外一帮人盯上了。2023年春寒料峭的时候,有人在网上用投票的方式代表全国人民对莫言进行起诉,要求莫言赔偿15亿

元人民币,也就是他代表全国人民让莫言赔偿包括莫言在内的全国人民每人一元钱。他的理由是莫言在小说中亲日、美化日本。笔者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居然有8000人表示支持。有一笔者认识的老同志也投了票,而且言辞激烈发信息来要我也投票。我回他一条信息:莫言的小说你读过几本?他答一本也没读过。我又问他读过几篇。他又老老实实在回答:一篇也没读过。八千多投支持票的民众,有几个人读过莫言的书呢?莫言的小说亲近日本吗?随便抽出一本被张艺谋拍成电影《红高粱》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出来,“莫须有”的罪名便不成立。

三

经常听一些人说,当代文学没有好作品。问他因何得此结论,他说报纸上就这么说的。他说报纸上说文学杂志订数越来越少,当代作家的作品基本上不能产生轰动效应……甚至搬出某国的所谓汉学家的“垃圾说”。

我问他除了读报纸,还读过哪些文学杂志?他摇头说:“我不读文学杂志,已经好多年不读了。”

顿感无限荒唐和悲哀。没有读过文学作品,却敢下“当代文学没有好作品”的结论,你不说他跟那个没有读过几本中国作家作品甚至压根没有读过、仅仅靠模糊的印象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某国的汉学家一样无聊和浅薄,都很难。

没有阅读就没有发言权。时至今日,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订阅过文学期刊或阅读过当代文学作品选的人说过“当代文学没有好作品”的话。回应那样的人其实很简单,只要问他以下几个问题:你读过几篇当代小说?你靠什么得出这个结论?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来证明你的结论?

他们在他们获奖之前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不可耻,可耻的是读都没读过却胡说八道。再说一遍:没有阅读就没有发言权!

坐看苍台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观众

□江徐

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中这样写道:“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的确,很多零散的、新鲜的、久远的或者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人人、事事物物,都会在日常某些不经意间触机想起,好似河底的零碎杂物浮上来,随流水悠悠漂上一段路程。

一日,站在水池旁切着冬瓜,听见附近小学传来的喇叭声,还有孩童放学时作鸟兽散的熙熙攘攘的扰攘。定神思之,眼下还在八月,八月初,学校还没开学呢,想来也许是返校的日子吧。现在的小学生暑假也要返校吗?继续切着冬瓜片儿,思绪渐渐渐远。

记得小时候,每年暑假期间都是要返校的,七月中旬返一趟,八月中旬再返一趟,为的是检查暑假作业的完成进度。每年放暑假,我们总是开心的,丝毫没有离愁别绪,也没有各种各样的作业的压力。除了暑假作业,每个人还会发到两张电影票,桃红色的,拿在手里觉得很可爱。把稀罕的电影票藏藏好,舍不得去看,因为只有两张呢,有时藏到最后,竟然忘了去看而逾期作废。真是流年逝水,逝水流年啊。

记得有一年暑假,三四年级吧,我和邻家的小姑娘结伴去镇上看电影。小娟比我大上四五岁的样子。吃过早饭,带上家人准备的水壶,还有一些小零食,戴上粉色镜框的太阳眼镜,然后就出发了。电影院在小镇东头,我们从西面来,一段人家,一段树荫,慢慢走,反正不起时间。穿过热闹的小镇中心。去的时候大概走一个多小时,看完电影再走回去,又是一个多小时。那会儿乡间到处都是泥路,一路上水杉绿荫连着绿荫,似乎也没觉得很热。记忆中,这是一次难忘的徒步旅行,兴致盎然又故作不以为然。盎然,是因为自在和愉快,不以为然又是何故呢?好像是为了在大家面前假装淡定,好像如果过于兴高采烈就会被取消这次独自旅行似的。

小学六年,在镇上唯一的电影院看过电影若干场。除此,学校还组织大家看过一场皮影戏、一场话剧。我还清晰地记得,话剧中有两个女人,那个好女人叫白玉兰,另外一个心眼很坏的女人叫黑牡丹。20世纪90年代,在江海平原,一个无名小镇的电影院里,居然还能观赏话剧表演和皮影戏,回想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只是当时已惘然。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的电影院,委实算得上镇上少有的繁华热闹之地,尤记一个夏夜,而且已经是深夜,我跟随大人从影院门口路过,正好电影散场,人潮如水,黑压压地从影院涌出来,涌至大门口,向东向西分流而去。真是巧得很,叔叔也在这人群当中,他赤膊骑跨在自行车上,看完电影正准备回去呢。我记忆中的画面是:叔叔身后,电影院门口两座高高的骏马奔蹄的雕像,人影匆匆,从马路下面移动着,消逝了。因为是午夜时分,回想起来更觉得恍如一场。“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前几年过年回乡下,特意转走去那里看看,带着几分凭吊的心情。二层楼的,玻璃幕墙的电影院,已经人迹罕至,荒烟蔓草,那些经过多年风雨的玻璃倒也没有破一块,或者碎一角,但已然历经岁月,满面沧桑。因为是阴雨天,这里看起来越发显出完全被时代抛弃于历史角落的那种寂寥和败落。门楣上方,“观众,您好”,四个美术体大字依然赫然在目。

又想起幼时年关将近,家人会择一个空闲的日脚,请宝国叔也就是小娟的父亲来家里写春联。那会儿很多人家的对联都是手写的。写对联的报纸提前几天从镇上集市买回来,一刀一刀裁好,压上几天,压平它。记得某年下着大雪,下得白天都像黑夜了,路面的雪越积越厚,白茫茫,明晃晃的。宝国叔握着毛笔、墨盒、对联集子在雪地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家中写对联。落雪天色的午后,屋子里悬着一盏日光灯,安静得可以地老天荒。他端坐八仙桌前,点上烟,吸两口,搁烟灰缸边沿,然后开始写,写一阵,翻一页对联集子。最畅销的金句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屋里静悄悄,谁也不大声说话,仿佛是用这份肃静表达对弄墨者的恭敬。我写过一首关于小时候过年的诗,有幸发表于《江海晚报》,其中一段是这样的:宝国叔叔握着一得阁和一只狼毫,踏雪而来/在糖葫芦那样的红纸上书写祝愿,书写企盼/横竖撇捺/工整简净/如同浸泡水里的年糕和竹笋/外婆塞给他一包红塔山/外公给晾干的“聚宝盆”贴上粮柜/将“六畜兴旺”贴上鸡窝羊圈……

听说小娟结了婚又离了婚,第二次结婚,嫁给一个比她小上好几岁的男孩。村人视为能事,评说道:“倒是给她嫁到一个初婚哩。”小娟有一个姐姐叫小萍,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相貌甜美,逢人总是笑笑的,笑露出两颗兔牙,和两个酒窝。她去外地打工,过年才回。之后不知怎么结识了一个人,据说那人在常州的一家外企上班,还是高管。据说他是有家的,但他很少回去。这又成为村里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好事者关心起一件事:他俩平时怎么交流呢?有人显得自己很有智慧似的,接了话头直白笑道:就那样交流啊,哈哈。听的人也随之哈哈一笑。很多人也许揣测着,这个男人大概肯定只是玩玩,玩腻了,就分了。没想到第二年孩子都生了,是个儿子,取名龙仔。用乡里方言说是,“龙汁”——尿液的谑称。年底,小萍竟带着那男人,还有和男人生的小孩回乡,村人奔走相告“龙汁来咯,龙汁来咯”,都像去看外星男人那样奔去看那个叫作龙仔的小孩儿。听说长得非常可爱,皮肤雪白粉嫩,小萍还是那样,打扮比以前更时髦了。但大家,包括我,都隐隐觉得小萍和那男人不会长久。毕竟,他有家室呢。难道他不回老家去了?谁知道他对小萍的心到底怎样?

去年回乡下过年,偶然听说,他俩似乎已经领证,小萍和孩子还跟男人去了一趟老家。可能是原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吧,毕竟听起来,那似乎竟真成了天长地久的一件事。

兼得斋夜话

何为读书人?何为社会的良心?

浅见

□杨譔

■诗和远方

“诗和远方”并不是指跑到天涯海角,或是去古村山乡过几天“陶渊明式”的生活,而是指在忙乱、烦闷、单调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与独立的生活态度。

■中庸

中庸不是简单保持中间状态,不是态度模糊,更不是没有立场和观点。中庸是积极、智慧、精准的选择;是“恰到好处”;是既“不过”,也不“不及”。中庸会因人因事因时因目的不同而随时发生变化。张謇当年辞官之后,为了地方事业能够发展顺利,与官方仍旧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做法”也是中庸的一种。

■三人行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按一般理解,重点落在前面一句,意为:三个人同行,其中必有值得自己学习的人。其实“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一句也同样重要:他人的不足要引起自己的警醒与反思,引以为戒,此是“反面之师”。自省与自我警示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故《论语·雍也》篇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师在,师与不师,如何师,仍在自己。

■格局

“格局”二字近几年使用频率颇高。经人劝说,放弃原有正确立场、愿意退让的人通常被视为格局大;凡事不做出头椽子,装聋作哑,还摆出一副对那些俗事不屑一顾的派头者,也被认为格局大。其实这两类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前者因利而懦,后者以伪谋名,他们的格局小如针尖。

《论语·宪问》篇:“士而怀居,不足以士矣。”意思是一个读书人如果只留恋自己安逸的生活,便不配做一个读书人。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何为读书人?何为社会的良心?刚毅、勇猛、仁爱、唯真、担当是也。有此五者,格局方可谓之大。

■识时务

“识时务者为俊杰”原是对人极高的评价,谓能依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反应,化解矛盾,掌握主动权,最后实现目标。

时至今日,“识时务者为俊杰”几与明哲保身、委曲求全、见风使舵为同义词。孟子言“孔子之谓集大成”,意谓孔子乃识时务者。吾以为为孔子“识时务”,必以保持正直、正义以及尽心知性、善养浩然之气为前提,否则,不足为士,何谈俊杰?



乐队 (AI绘画)

为官从政,非一时一地之事,乃终身之业。真正的从政之道,在于穷尽一生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境界。

修身理政 穷尽一生

□凌云

给别人看的表演,而是对自我灵魂的不断洗涤;不是到达某个阶段就可以停止的功课,而是贯穿一生的精神操练。

理政智慧需要穷尽一生去积累与提升。优秀的从政者明白,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极其复杂的艺术,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与实践。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治学态度,使他成为三国时期最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创新,源于他对明朝积弊数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果敢决断,背后是多年对国际形势的深入研究。当代社会治理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等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政者若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必将被时代淘汰。王安石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正是建立在终身学习的基础之上。理政智慧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持续汲取历史经验、洞察现实问题、把握未来趋势,才能在复杂局势中作出正确判断。

为民情怀是为官从政的灵魂所系,而这种情怀需要在漫长岁月中不断深化与升华。唐代诗人白居易“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民本思想,使他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亲民官员;北宋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为官准则,让“包青天”的美名流传千年;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奉献精神,诠释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的为民情怀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液的信仰;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经年累月的坚守。从政者若不能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